

拇指山下一段緣

拇指山下一段緣

拇指山下一段緣

拇指山下一段緣

拇指山下一段緣

拇指山下一段緣



藥四屆 喻麗清

我是一九六七那年畢業的，算是北醫第四屆的畢業生。匆匆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想來真是驚心。那時候，北醫是在六張犁拇指山下立校不久的一所私立醫學院。當時，醫學院之中，除了台大之外，就算北醫的號召力大了。因為國防醫學院要受服役的限制，高雄醫學院又暮氣沉沉，北醫十分清新，很是叫座，甚而有台大牙科、化工等系的學生轉學過來的。

我跟北醫，算是三生緣定。我頭一年考大學的時候，考上北醫牙醫系。註冊那天，興匆匆往學校一看，大失所望。只見山脚下孤零零幾棟大樓，新植的楓樹瘦瘦的一排，這樣簡陋的校園真是連我唸了六年的北二女都比不上。我心一涼，冊也沒註就回去了。那時候，醫科屬於甲組，女孩子報考甲組的很少（我還記得高二高三時收到師大附中的男生們給我們寄來聖誕卡，上書：給美麗的敵手們），能榜上有名就不錯了，我還挑三選四的，回去當然又是一番「革命」。仗着自己早了一年唸書，就誤一年不算什麼，我第二年再考，又考上了北醫，這一次是上了藥學系的榜，我嘆了口氣，只有認了。就這樣子我進了北醫。

說實話，我對聯考制度並沒有一般人那樣的憎惡。因為我一直是個按部就班的安份學生，書也讀得不苦，功課也還不錯，到高三時還有閒情偷偷寫了篇小說去參加皇冠雜誌的徵文——這是我寫作的開始。

當然，為硬擠進大學，而唸了與自己志趣不合的科系，確也是件痛苦的事。不過，十幾歲的大孩子，所謂的志趣，大概不外朝二個方向發展：一是父母或潮流所推動的那個方向；一是反抗父母或潮流所趨而走的逆方向。至於我，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我兼顧了二個方向。所以我雖然進了醫學院，可是花在寫作看小說上的時間也不比在實驗室裏的少——至今依然如此。

由於平鑫濤先生善意的逼迫（每個月要給聯副及皇冠各寫一稿）我的「拇指山下」開始在聯副連載。那時候，我才真正想到志趣問題。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樣，不是因為聯考這個制度才斷送了志趣前途的，而是因為自己的個性使然。因為如果我真是很想當作家的話，我很可以不考甲組或到大二時轉學轉系。不過我考慮再三，一方面是我對於自己寫作的「天才夢」少有信心，二方面想醫學院這樣難進，金飯碗不拿白不拿，所以還是硬頂了下來。

那個時候，正是「強說愁」的年紀，有這麼個要不要轉學的「痛苦的結」打在那兒，正好可以大作其文章，所以到大二時正書是不大讀的，所有的課外活動都沒有不參加的。我忽然覺得一輩子都做個安份的好人實在划不來。當然，現在我已明白做個好人不是划不划得來的問題，而是不做個好人你更不得快樂。

前些時候，我到舊金山去看詩人紀弦先生，他還跟我提起「北極星詩刊」，說北醫是大專院校當中第一個出版詩刊的，我覺得好驕傲，因為詩社是我成立的，詩刊是我辛辛苦苦籌了稿子又籌錢才出出來的。那時候可真是勇氣

可嘉，除了詩刊，我還編過校報、校刊，系裏自然會會刊以及給話劇社編劇本——我記得是把王藍先生的短篇小說「吉屋出售」拿來改編的。十二年了，原稿早已不知所終，可是那多方面嘗試的經驗却使我受益無窮，至今難忘。

醫生們，在台灣有個極其可愛的傳統，就是除了自己所學之外，對於藝術、哲學方面的修養也相當重視。我們的院長徐千田先生，不僅是婦科權威，他的汽車裏頭還堆滿了各種書報雜誌。我們的學長裏頭真不乏對古典音樂、圖畫、書法、佛學研究等等極有造詣之人。現在北醫圖書館裏所懸掛的一幅「解剖」油畫，就是比我高一屆的一位醫科同學參加師大藝術系的畫展得過獎的。也許，醫學院的學生比一般其他的大學生更懂得肉身之外的某些東西的價值吧。當然，庸俗的人也不是沒有。

在美國醫學院難進去也難出來，訓練得似乎比台灣的嚴格些，一般人說是醫生們要控制他們的經濟市場之故，我覺得那是由嫉妒而生的毀謗，主要的原因我想是不願粗製濫造的意思。別的科系只關係學問，可深可淺看日後的修行。醫學事關人命，真是含糊不得。

我幸而唸的是藥學，不然像我這般「混」出來的醫生，實在跟「江湖郎中」所差甚微。唸醫學院的否認是爲了賺錢多才去，也未免有點兒虛偽，可是純爲了打算賺錢在那兒混著文憑，說實話是很令人寒心的事。所以我覺得既要唸醫，就得下定吃苦的念頭，不能跟整天郊遊、開舞會的其他科系去比玩的事。

楊步偉女士在「一個女人的自傳」裏說，她不主張她的女兒唸醫，要唸醫就要放棄成家的打算，因為她覺得唸醫要下很大的苦功，如不能服務大眾，便是一種浪費。她的仁心，我實在衷心感動。現代的醫學士不知有幾人能作如是想？

有人說：大學生活是多采多姿的，其實也是因人而異。大概住宿舍和在外租房子自住的大學生，生活上的趣味多些，還有談情說愛時的趣味多些，此外如果埋起頭來仍可能只是像高中生似的一——連讀書的方法都可能如此。到了國外才發覺，我們在國內時找資料、看最新的研究報告的能力訓練都做得很差。

現在的大學生對於國家、社會的意識比我們那時候強多了，這實在是很好的現象。現在每年暑假，大學生自組什麼服務隊，到山地、孤兒院，到需要服務的地方去貢獻所學的比比皆是。我們那時候只有少數的幾人參加天主教的團體去上山下鄉的，大部分的人還是跟社會挺脫節的。

我很感謝救國團舉辦的幾個講習會：文藝營、出版研習會、歲寒三友會，都是我生命中的「成功嶺」。雖然我因爲太過於「轟轟烈烈」的，大二時幾乎給「當」掉了，不過，我還是主張大學生應當多參加活動的——尤其是參與社會的工作，這樣才能給自己走出象牙塔去的機會。只是不宜喧賓奪主，別忘了唸書的正事。因爲慈心悲懷固然重要，如果沒有相當的學識與能力，你的慈悲是沒有力量的。非洲之父史懷哲，如果他沒有教會的支持，沒有醫學的知識，你想他空有同情非洲人之心又有何用？

在北醫，很有幾位令人難忘的好老師，系主任徐型堅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清廉正直、謙和可親，把我們都當自己的孩子似的呵責。我至今記得他罵那些不好好唸書的男同學的話：「女孩子嘛！我可以送她們一張文憑當嫁粧，你們可不行，不唸書我是不客氣的。」我還跟教官陳東佛先生學過作古詩呢！

大四快畢業的時候，我結了婚。外子是高我三屆的學長，我們系裏女生又少，所以男同學們都不服氣說是學妹被學長騙了，肥水落了外人田了。不過，他們還合送了我一塊金牌——冠軍——作結婚禮物。我常常說，在北醫我最大的收穫倒不是戴了方帽子，而是嫁了個好丈夫。

北醫成立了校友會以後，去年在芝加哥曾舉行了一次全北美校友的聚餐會。當日校友的學術演講，並獲美國醫學會授與四小時的學分。連卡特總統的小兒科顧問也是我們的校友，其他當了教授、各科主任、藥局主任等等的傑出校友更是不計其數——這還只是指在美加地區的而言，在台的校友大概就更加有聲有色了。我覺得能擠在北醫校友當中，即使當一名啦啦隊員，也是我的光榮。（一九七九年除夕寫於柏克萊）